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声迢递

钱婉约◎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声迢递

钱婉约◎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声迢递 / 钱婉约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4

(全民阅读书香文库)

ISBN 978-7-5439-6219-4

I . ① 书… II . ① 钱… III . ① 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 ①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7218 号

责任编辑: 祝静怡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丛 书 名: 全民阅读书香文库

主 编: 徐 雁 宋旅黄 王宗义

书 名: 书 声 迢 递

作 者: 钱婉约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21 000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219-4

定 价: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序

◎ 钱 行

一

书名为《书声迢递》，这“迢”，就是远，是一个距离概念。路远迢迢，可以是一百里、一千里，可以是中国各地、世界各地。在这本书里，有写到中国、日本、法国、美国等等，可谓远矣。书声可以从这边传过去，也可以从那边传过来。也就是迢递了。这是从空间来说。

时间也有远近。近，就是现在，远，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未来。这本书中有讲古代史的，有游古迹的，这是历史传来的消息，也可以说是书声迢递吧。而且，这递，除了传过来，应当还有传下去之意。作者或许希冀这书中声音，也能往远处传递、向后代传递吧。

书声迢递，从远处来，往远处去；从前人来，往后人去。让书声迢递吧。

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文章是千古事，读书应当也是千古事。

本书第一篇就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读书是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古人读书，今人读书，后人也要读书。但是读书的得失，也只有读书的人自己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古人的一种说法；而今人也还有这样认为的，或许后来也还会有这样看问题的人。本书作者不认为读书是为了做人上人，而是说，读书是事关个人修身、文化传递的一种精神追求。仍用古人的说法，就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在这本书第一篇中，还提到了一个“思、习、行结合”的说法，窃以为，这是相当地切中时弊的。有一篇谈论钱宾四先生思想学术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现代学术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学分离，也就是‘学’与‘德’分离，这个‘德’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理解的‘道德’，而是做人要与治学是一致的。而现代学者，且不论当代，就从晚清到民国，私德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而钱先生为什么能拥有那么多真心的追随者，实是人学是合一的，是一致的，他所宣扬的文化真相与他的所为所行是不悖的。所以，读宾四先生的书，心中始终是温暖的，

无论世道人心如何，总不会失去信心。”（《贾克文先生与孙鼎宸将军》，收入拙著《思亲补读录》）这段话的意思，或许正可以与本书的“思、习、行结合”相互发明吧。本书中有多篇写到读钱宾四先生书的，应当也可以作为这第一篇“读书是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的一种具体说明。若从反面看，不注意这“思、习、行结合”，那就会是上面所说的人与学分离，学与德分离。或者如钱宾四先生所说的，当代新学术有二病：“一则学问与人生分成两概。不效乾嘉以来科举宦达，志切禄利，则学欧美自由职业，竞求温饱”；“二则学问与时代亦失联系。……学问亦绝不见为人格之结晶，仅私人在社会博名声占地位之凭借而已。”（钱穆《新时代与新学术》，收录于《文化与教育》中）钱先生那时提出的问题，几十年过去了，这问题仍然存在，仍要我们去再提出，再思考。

此亦可见书声迢递，可见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之一斑了。

三

本书作者前几年出版过一本《梅樱短笺》，其中许多篇章是写日本文化的。现在这书中又有《汉籍输入日本史话》等好几篇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字。这使我联想到最近从《晚学盲言》中读到的一则轶事。那是中国对日

抗战胜利以后，钱宾四先生第一次去日本访问，谈及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之影响时，他问一日本学人，你们常说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体现何在？日本学人回答到：“中国人骂人说，你这样无道，不讲理，还算个人吗？这句骂人话，全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只有我们日本人也普遍这样骂人。这是我们日本人接受中国文化的一个明证。”钱先生接下来说，“此语有甚深妙义，我此下二十多年常以此语告国人”。（钱穆《己与道》，收录于《晚学盲言》）我读了这则以后，就问自己，这话的“甚深妙义”在什么地方？——岂不是让我们日常言行要讲究做人的道理，不能做得不像个人吗？若再将“思、习、行结合”，则读此则之后，思之，当比不读此则之前，行为有所进步，有所“更像一个人”。

推而广之，所有读书，都当使人明智而进步，否则，书，就是白读了。

四

戏剧多反映人生矛盾，而戏剧在人群中引起的反应和评论，也必有差异，必有矛盾。恐怕不限于任何剧种，包括电影、歌舞剧，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书声迢递》中，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方面的文字，还有多篇观剧论剧的文章，看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吧。

目 录

读 书

读书：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	1
汉籍输入日本史话	7
究原委以见传统	19
道统不废	36
陈垣先生的“古教四考”	42
顾颉刚先生与《古史辨》	47
钱宾四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	52
“夸父逐日”新解	57
漫话金山高氏南社人物	65
《朗读者》中的阅读寓言	74
鲁迅为何到仙台去学医？	80
彼岸的风景：林文月	84
昆季、兄弟、镜台	91
游目诗海话“白日”	94
从“支那”的名称说起	99
“赛里斯”与“羊毛树”	103

与君共此一炉香	108
春凳闲话	115

行 路

“小跑” 卢浮宫	123
正仓院：再现八世纪贵族的生活情致	133
“隐元豆” 与 “菊舍句碑”	141
在普利茅斯，感受美利坚的起源	147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153
新泽西雕塑公园	157
不一样的水城	161
走马观花越南游	166
澳门地名趣谈	172
岭南山水古韵长	177

看 戏

漫话《苹果》	180
《左右》抉择时的命运意识	187
看话剧《简·爱》	194
再识易卜生	200
台湾舞剧《醺》	204
穿越时空的“白毛女”	207
后记	211

| 读 书 |

读书：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文精神的文明古国，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背后，存在着维系历史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即道统与政统。道统是道德精神的传统，它的承传者是历代的儒师、士人；政统亦可称君统，是封建皇权的传统，它的承传者是历代的君主、帝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向来是道统居上而政统居下，“师”更崇于“君”。国君、帝王的权威至高至尊，但相对于“道”而言，亦只是“替天行道”的“天子”。可见，只有“道”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尊师重道”是中国社会每一个人（包括帝王在内）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回念中国历史，国君、帝王世代更替，除个别杰出者外，大多泯灭无闻；而孔夫子则被称为圣人，成为万世师表，孔孟儒家弟子代代相传，辈有人杰，历久不衰。这正是“尊师重

道”的历史印证。

由于尊师重道的价值观念，历代中国人在培养子女、教育子弟时，十分注重教导他们读书为学。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可见读书为学被视为继承和弘扬道统的重要途径。历代中国家庭，无论皇室官宦、士绅富贾，还是农家佃户，甚至贩夫走卒，只要有能力的，无不使其子弟拜师读书，以开其智，以启其德。自孔子起，历代教育家、文人、儒士，留下了丰富的读书古训和生动感人的读书故事。概而言之，这些言论典故，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思想内容。

第一，读书为学的首要意义是修身弘道。通过读书学习，了解圣贤经传中的“微言大义”、道德精神，了解古代历史上的人物故事、兴衰业绩，从而“见贤思齐”，戒除愚昧，克己修身，以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孔子教导弟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要求学生摒弃衣食住方面的物质奢求，专心向学，求教就正于有道德学问的人。并鼓励学生以自己的努力学习，来弘扬道德精神。西汉扬雄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扬雄《法言》）这也说明读书学习对于涵养性情的作用。在修养方法上，孔子提出“君子有九思：视思

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所以，孔门弟子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做法。孟子提出“知耻”是修身的先决条件，所谓“知耻近乎勇”就是说只有知耻才能勇于改过；过而能改，就是修身为学的起点。宋明以来的理学家，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格物、穷理、立志、主敬、存养、省察等一系列的修身科目。总之，读书为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使人能做好一个人——一个合乎道德精神、伦理标准的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就是赞扬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和充实自己，批评后来的人学习只是为了装潢门面，炫耀于人。宋代朱熹又进一步发挥说：“为学须是切实为己，则安静笃实，承载得许多道理。若轻扬浅露，如何探讨得道理？纵使探讨得，说得去，也承载不住。”（《朱子语类·学二》）换言之，一个读书为学的人，应该做到正心诚意，谦恭谨慎，忠厚朴实，不务浮夸，同时，自尊自爱，甚至舍身成仁以追求真理。而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成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最高人格理想和人生追求。

第二，读书须求广博，为学须求通达。孔子主张博学，在对六艺之文广泛通读、博闻强记的基础上，还要求弟子多问、多闻、多见、多识，《论语》中有许多有

关这方面的语录。如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于礼”(《雍也》)，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子张》)，孔子自己“入太庙，每问事”(《八佾》)，孔门弟子多“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泰伯》)，这些是说的“多问”。“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这些说的是“多闻”与“多见”。孔子对于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也是十分注重的，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懂得观察“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阳货》)等自然现象。可见除了博览群书外，问、闻、见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所谓广博的知识，不只是经、史、子、集所载之书本知识，还包括学习者个人实践所得来的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这一主张，被孟子、荀子、司马迁、韩愈以及顾炎武、颜元等儒家学者继承和发扬。所以，古代有成就的学者，往往都能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读书须求广博相应，在为学境界上，中国人视通达高于专精。如精研一经者，只是某一经的专家，如能兼通五经、十三经，就是经学中的通人；但随着古代文化的发展，“经”以外，又增加了“史”“子”“集”，即所谓“四部”，那么，“经学通人”也只是“经学专家”。如能由经而旁及四部融会于心，而善出善入，进退古人，唯大义本原是举，就是所

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通儒的为学理想。

第三，读书为学须与“思”“习”“行”相结合。俗语中有“两脚书橱”之喻，用来嘲讽那种只知啃书本、死读书，虽满腹经纶，却毫无见解、食古不化的人。也是批评这些人读书为学未能与“思”“习”“行”结合起来。所谓“思”，即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把所学知识通过思考而加以分析、整理、引申、归纳，作出自己的评判。这样才能学有所感，学有所获。“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讲明了学与思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孟子也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朱子则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子语类·学四》）所谓“习”，就是“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即练习、实习之意，对学得的知识应不时温习，以求熟练掌握，并到实践中去实习以求得检验，只有如此躬身实践，检验考证，才能使所学知识真正为己所有。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行”，即行为实践，通过“学”“思”“习”所得到的知识和道德教育，必须付诸实际行动，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才是达到了学习的最终目的。古代儒家学者历来注重“知”与“行”的关系，反对那种高言凿空，言行不一的人。《论语》

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都是要求学生言必能行，言行一致，力戒言过其实。思孟学派曾把学习过程概括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五个步骤，这种概括对于后世影响很大，朱熹就曾把它列为《白鹿洞书院教条》的一部分，作为“为学之序”来要求学生遵循。

纵观中国古代关于读书为学的这些古训、典故，它注重道德情操的培养，把为学与为人结合起来，强调从自我修养做起，而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它主张读书应胸襟开阔，从高处、远处着眼，使学问臻于极广大、至高明的境界。它还强调把读书为学的认识活动引入现实生活的行为实践中，使知行合一成为读书人的信条。这些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

清代以来，从顾炎武，到乾嘉学者，到魏源、曾国藩、张之洞以至胡适，都曾热心倡导过读书运动，尽管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地位、思想主张也不同，致使他们对于读书运动的期望也各不相同，但认为读书运动有助于学风、世风的转变，则是共同的。并且，每一位读书运动的倡导者，无不以重温前人教导，总结前人经验为先导。

读书，是中华民族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

汉籍输入日本史话

一、关于汉籍初传日本

中日两国的相关著作中，一般都把百济博士王仁向日本天皇上贡《论语》《千字文》一事，作为中国典籍输入日本的开端。

这件事的最早记载，见于《古事记·卷中·应神天皇》条：

“天皇命令百济国说：‘如有贤人，则贡上。’按照命令贡上来的人，名叫和迺吉师，随同这个人一起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和迺吉师是文首等的祖先。”（《古事记》，邹有恒、吕元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六年》条，也有相关记载：

“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

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

由这两段记载引出的关于王仁献书事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古事记》里的“和迩吉师”就是《日本书纪》中的“王仁”吗？虽有日本学者如大庭修认为未必是一个人，但一般的中日学者都认同这是同一个人的同一件事情，和迩是王仁的古日语发音。其次，关于王仁献书的时间，由于日本历史在推古朝圣德太子之前尚无本国文献记载，因此，这之前的天皇系谱便介于传说与史实之间。而这里的“应神天皇十六年”的确切所指，因而也就成了有学术纷争的问题。中日著作中就分别有公元 285 年、四世纪后半期、公元 405 年等不同对应。最后，由于汉籍初传日本的时间不能确定，同时就引出输入《千字文》的可靠性问题。我们知道《千字文》是梁朝周兴嗣所作，他于公元 494 年考中秀才，公元 502 年梁武帝即位后屡次献韵文作品，卒于公元 521 年。这样的话，前述王仁所献《千字文》，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了。王仁不可能献上晚于他百年后编成的某一种书籍。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不能十分肯定地比对出关于中国汉籍初传日本的确切年代，但一般说来，至晚在四世纪和五世纪之交，由于日本对朝鲜半岛上新罗、百济国的征战和统辖，使得朝鲜半岛的汉籍经过掠夺或贡献的